

中尼经济关系

Ifeanyi Sunny Odinye,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namdi Azikiwe University, Awka
Email: is.odinye@unizik.edu.ng

摘要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其生产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融资能力，为尼日利亚提供了动力。由于尼日利亚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参与已经远远超出石油。尼日利亚的制造业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正在看到来自中国公共和私营公司的投资。本文的目的是考察中尼经济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规模庞大且不断扩大，而尼日利亚在中国的投资规模要小得多，部分原因是尼日利亚无法在中国与中国产品竞争，使其经济安全面临中国霸权的威胁。

介绍

尼日利亚通过埃及与中国人进行了第一次接触。1957年，中国大使馆在开罗的商务官员 Chan Hanq Kang 与尼日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加纳、埃塞俄比亚和坦噶尼喀（现坦桑尼亚）建立了秘密的经济关系（Utomi, 2008年）。然而，1971年2月，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尽管美国反对，尼日利亚和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做出了贡献，有利于北京在21年的努力中争取在同年获得普遍承认为中国唯一真正政府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PRC）于1971年11月25日在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取代中华民国（台湾）（Alobo, 2014）。

由于邓小平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改革计划，中国惊人的增长和现代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能源和市场扩张需求，使其与非洲的联系更加紧密（Utomi 2009）。尼日利亚将这种新的扩展存在视为西方关系的替代模式，主要来自欧洲、美国和加拿大。这导致在1971年建立了大使级接触（Utomi 2009, Kwanashie (2000)），此后这种关系一直顺利地稳定地发展。在随后的30年中，亚洲和非洲人口庞然大物之间的外交接触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经济意义。在中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尼日利亚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接连发生军事政变，两国于2001年签署协议，在中国设立尼日利亚贸易办事处，并在尼日利亚设立中国投资发展和贸易促进中心。2006年，尼中投资论坛作为政府间机构成立，中尼贸易额从2000年的不到20亿美元，在短短十年内增长到约180亿美元。2003年至2009年，尼日利亚是非洲大陆第二-中国FDI最受欢迎的地点，仅次于南非。它的魅力显而易见：巨大的能源储备和1.5亿人口的国内市场。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鉴于尼日利亚最近摆脱了由尼日利亚繁重的军事独裁强加的贱民国家地位，这种密切相关的关系是合理的（Udeala, 2010年）。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其生产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融资能力，为尼日利亚提供了动力。由于尼日利亚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参与已经远远超出石油。尼日利亚的制造业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正在看到来自中国公共和私营公司的投资。他们正在尼日利亚各地建设新的公路、火车和机场，并开发两个经济特区。中国还因其提供无条件援助的政策——即所谓的“合作”——以帮助实现

发展目标而受到认可。数百名中国专家正在带来新技术和新技术，以努力提高尼日利亚的农业产量。近期中尼关系的发展与两国关系重燃不无关系。中尼虽于 1972 年建交，但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双方发生了巨大的积极互利发展。

事实上，在 1999 年至 2014 年期间，高层外交访问和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都有记录。两国将从经济合作中受益匪浅，但一些障碍可能会阻碍发展。尼日利亚人对中国公司的劳工标准、廉价进口商品的质量以及这些进口商品对本国生产商的影响表示不满。尽管中国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低于其他国家，但尼日利亚的政治不稳定最终可能会阻止他们继续投资。尽管在谁应该为假冒和走私商品负责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两国仍然保持着友谊和善意（Utomi 2009 和 Kwanashie, 2000）。

尼中关系的历史背景

尼日利亚与中国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 1960 年，当时中国代表团应尼日利亚政府的邀请参观了尼日利亚的独立庆祝活动（Ogunsanwo 2018）。代表团带来了中国领导人的贺电，祝贺尼日利亚战胜了殖民主义。尼日利亚终于在独立十多年后的 1971 年 2 月与中国建交。一年之内，两国都在对方首都开设了大使馆。此后，中尼双边关系逐步发展。

1972 年，作为军事国家元首的 Gowon 将军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要求为战后重建计划提供财政援助，当时中国支持比夫拉运动（Pease, 2010）。1977 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导致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被孤立后，阿巴查将军也支持中国。1998 年，时任中国总理李鹏访问尼日利亚，以重新点燃中国对尼日利亚的兴趣。国家和扭转该国的贸易衰退（雷诺，1999 年）。

2001 年，时任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访华，主要是为了吸引中国商人投资尼日利亚经济。访问期间，两国达成的双边协议以石油领域的经济协议为重点，使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尼日利亚石油、天然气和石化行业的上下游产业。事实上，奥巴桑乔向中国提供了对石油集团的优先购买权（RFR）的折扣，以换取对石油下游和运输部门的必要投资，特别是在石油勘探和公路和铁路建设领域。2006 年启动石油区块招标时，中国国家石油委员会（CNPC）获得了四个石油区块和两个石油生产许可证，以换取对尼日利亚卡杜纳炼油厂的 20 亿美元投资。两国还有石油换基础设施交换项目，中国获得了价值 50 亿美元的公路和铁路开发合同，并获得了等值的原油。

2006 年，尼日利亚和中国结成战略联盟，允许两国商品和服务不受限制地进入对方市场。由于石油招标过程中的高度腐败以及许多中国投资者的项目执行不力或不执行，石油换基础设施计划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石油换现金政策，允许中国支付等值的现金从尼日利亚进口石油，而石油基础设施项目是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CSCEC）下进行的。中国信保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修复尼日利亚三座炼油厂和建设原油精炼燃料综合体的 230 亿美元合同提供了融资，融资总额为 80 亿美元。CSCEC 承担了 80% 的费用，NNPC 提供剩余 20% 的配套资金。这家中国公司还协助尼日利亚开发了 2007 年发射的 NIGCOMSAT-1 卫星。

2007 年 5 月 29 日，接替奥巴桑乔出任总统的奥马尔·穆萨·亚拉杜瓦审查了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的“石油换基础设施”协议，在查塔姆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尼日利亚输掉了合同后，导致合同中止。由于缺乏执行交

易的后续机制，与中国达成的高达 60 亿美元的石油交易失败，导致部分执行。此外，调查委员会的研究表明，有几个石油区块被授予与尼日利亚政治权力走廊有密切联系但没有工业经验的中国投标人。中国要求亚拉杜瓦政府出售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产，估计有六桶石油储备，以换取 500 亿美元用于尼日利亚基础设施发展的替代融资（2010 年今天）。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SINOPEC) 收购了加拿大 Addax，后者是西非领先的石油生产商之一，在尼日利亚拥有广泛的海上活动。

在古德勒克·乔纳森执政期间，尼日利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三项贷款协议。该协议包括一份价值 5 亿美元的阿布贾轻轨项目合同，一份价值 5 亿美元的尼日利亚四个机场航站楼开发合同，以及一份价值 1 亿美元的尼日利亚政府部门间银河骨干通信扩展合同 (NICAF, 2013 年)。古德勒克·乔纳森 2013 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表达了对中国公司在尼日利亚投资超过 250 亿美元的兴趣，其中包括中国能源部与尼日利亚能源部签署的 200 亿美元谅解备忘录，旨在为尼日利亚提供 20,000 兆瓦的电力。在布哈里执政期间，中国还向尼日利亚提供了 6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以及 15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包括拉各斯、卡诺、阿布贾和哈科特港四个机场的扩建，布哈里政府还签署了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由于这一努力，从中国进口商品到尼日利亚的成本降低了，反之亦然，降低了两国商品的售价。

尼中关系的重要性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其对外投资和帮助任何国家的重要基础。由于几乎没有国内和全球竞争对手，中国企业从在非洲的投资中受益。然而，由于其不断变化的性质和国际标准，中国在环境合规方面面临更高的风险 (Bartels、Alladina 和 Lederer,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未能幸免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这可以从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其投资的减少中看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9 年)。根据 Idun Arkhurst 和 Laing (2007 年) 的报告，在全球对采掘业原材料需求的推动下，非洲经济体的 FDI 在过去三年中持续增长 25% (Idun-Arkurst 和 Laing, 2007)。

因此，中国与非洲，特别是尼日利亚之间的关系显著发展。在许多方面，中国模式对双方都有利，特别是在投资、外援和债务减免方面。在许多方面，中国的投资对尼日利亚有利，但与任何其他投资一样，它也是有代价的。尼日利亚为其当地投资、文化和道德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还对当地贸易和商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尼日利亚工人在许多情况下没有从中国投资中获利。尽管如此，尼日利亚还是受益于中尼在农业领域的贸易关系，尤其是棉花产量，从 1994 年的 2.2% 增长到 2002 年的 15% 和 20% (UNCTAD, 2006)。由于棉花贸易的增加，尼日利亚的棉花产量有所扩大，对中国的棉花出口贡献了 10%。对生姜、山药、木薯、皮革和丝绸等农产品的新投资加强了贸易联系。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贸易对尼日利亚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领域。中国企业帮助尼日利亚全境基础设施建设。他们参与的项目包括建造水坝和热电厂，以及体育场、铁路、公路网络和机场。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正在为这些项目提供部分或全部资金 (Wang, 2007)。尼日利亚 20 年铁路重建计划的第一阶段，耗资 83 亿美元修复拉各斯和卡诺之间破旧铁路的项目就是一个例子 (White, 2006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和印度跨国企业 L. N. Mittal 投资 60 亿美元用于铁路、炼油厂和电力，以换取尼日利亚的石油勘探权 (Bello, 2007 年)。这意味着尼日利亚受益于这些投资以及根据当地内容法进行技术转让的潜力。

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中国民营企业方面，尤其是 1985 年的非限制性投资政策，中国私人投资者在尼日利亚开展的贸易活动涵盖中小型和跨国公司。例如，浙江省东部的哈山公司在当地的制鞋企业投资了 600 万美元。此外，电信巨头华为已在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投资超过 10 亿美元（Wang, 2007 年）。此外，非正规部门受益于中国私营企业更多地参与尼日利亚经济。在尼日利亚主要城市的几个地区，建设了更多的中餐馆、电子电器商店、消费品和“中国城”（Tull, 2006）。讨论拉各斯的案例研究很有趣，三个中国商业村交易从中国进口的消耗品、国内物品和布料。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的贸易政策，特别是“一个中国原则”和“双赢原则”对尼日利亚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影响。根据 Policy Insights（2008），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干涉贸易伙伴内政的理念，这与“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因此，《经济学人》（2008 年）表示，中国必须考虑其经济利益和投资，而不是干涉，应该支持任何当权政府。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而不是国际经济制裁。然而，有些人认为这一举措违反了人权、民主、开放和问责制，所有这些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成功所必需的（Tull, 2006 年）。

根据（Pang, 2003 in Taylor, 2004），中国双赢原则为中国和尼日利亚提供了互惠互利。据他说，这是通过中国公司支付补偿来实现的，事实上，每当项目完成时，他们都会进行当地的开发，例如钻孔、道路柏油和学校改造。不仅如此，这个想法还有助于尼日利亚出口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反之亦然。据称，这种方法可以鼓励这些国家在农业、技术和基础设施开发领域建立商业伙伴关系（Agubamah, 2014 年）。尼日利亚和整个非洲的企业应进一步探索这一概念，以促进该国的发展。

尼中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

其中一个重大问题是尼日利亚基础设施的现状非常不完善，特别是在电力、铁路网络系统和通信领域，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解决这些问题，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外国投资流入将继续避开尼日利亚，直到它面临这些担忧。另一个问题是巨额贸易逆差，这继续对中国有利。2005 年尼日利亚和中国的贸易总额为 25 亿美元。尼日利亚仅从中获得了 4 亿美元，而中国获得了 21 亿美元（Alli, 2007）。

糟糕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尼日利亚参与全球经济的尝试。因此，中国已成为其最有价值的技术合作伙伴。然而，人们对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作用表示担忧（Akongbowa 2008）。由于大多数中国企业将整套设备和中国人员带入中国，因此从中国 FDI 传播的技术正在变得微不足道。赞法拉州政府就是这种情况。州政府已同意斥资 2.5 亿美元开发三个新的加工厂和冶炼厂。中国企业拥有 90% 的合资项目，而赞法拉政府拥有 10%。中国公司将设计项目，选择合适的技术，购买所有设备，安装和运营，而赞法拉政府将提供土地，获得勘探采矿许可证，为中国投资提供保障，并雇用 5,000 名当地矿工（2010 年的今天）。

中国对广泛的社会暴力造成的高度不安全感表示关注。外国投资者被绑架的案例屡见不鲜，他们的财产和利益受到攻击。例如，在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加油和破坏石油设施。从种族战争到宗教争端，尼日利亚的永久不安全无疑将使尼日利亚政府为吸引国际投资而提供的任何激励措施黯然失色。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于 2006 年 4 月谴责中国在尼日利亚南部对石油资源的数十亿美元投资。据该组织称，中国的投资将被视为“小偷”，该组织还承诺进一步攻击石油员工和基础设施（乔纳森 2009 年）。

尼日利亚和中国的联系

尼日利亚与中国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 1960 年，当时中国代表团应尼日利亚政府的邀请参观了尼日利亚的独立庆祝活动（Ogunsanwo，2018 年）。代表团带来了中国领导人的贺电，祝贺尼日利亚战胜了殖民主义。尼日利亚终于在独立十多年后的 1971 年 2 月与中国建交。一年之内，两国都在对方首都开设了大使馆。此后，中尼双边关系逐步发展。1972 年，作为军事国家元首的 Gowon 将军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要求为战后重建计划提供财政援助，当时中国支持比夫拉运动（Pease，2010）。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导致中国在 1977 年在全球范围内被孤立后，阿巴查将军也支持中国。

1975 年安哥拉内战期间，尼日利亚支持由苏联支持的 MPLA，而中国支持由美国和中央情报局支持的 FNLA。尼日利亚在 1993-8 年阿巴查独裁统治期间采取了“向东看”政策，当时由于该政权令人震惊的人权记录，西方援助再次被切断，这巩固了北京-阿布贾联盟并在两国之间建立了信任。

合作一直持续到今天。自 1999 年尼日利亚民主选举开始以来，每一位尼日利亚总统都曾访问过中国。2005 年，中国和尼日利亚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支持尼日利亚 2015 年作为常任理事国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尼日利亚支持中国在太平洋地区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中国还在尼日尔三角洲的平叛活动中提供了军事援助（Ramani，2016；Umejei，2015）。

由于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有所改善（反之亦然）。尼日利亚独立后，多家香港公司在该国投资。共产党接管后，一些中国大陆的人搬到了香港。其中两个仍然活跃在尼日利亚。鞋子、面包、塑料袋、钢材、陶瓷都是李氏集团生产的。第二个是西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WEMPCO），是一家由董氏家族管理的陶瓷、建筑材料和酒店公司。它刚刚于 2015 年在非洲开设了世界上最大的冷轧钢厂（Chen 等人，2016 年）。

中尼两国于 2006 年签署了第一份关于发展战略关系的谅解备忘录（MOU），这在非洲国家中尚属首次。此次合作促成了一项以石油换基础设施的交易，在该交易中，中国公司可以优先获得石油加工许可证。大量中国贷款来自总统出访。乔纳森总统 2013 年的北京之行获得了 3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贷款，其中包括扩建拉各斯、卡诺、阿布贾和哈科特港的机场。继布哈里总统于 2016 年访问尼日利亚后，该国获得了 6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贷款（Omolade，2019 年）。

来自中国的公司正在逐步迁往尼日利亚。据当地投资机构称，截至 2013 年，有 208 家中国公司在尼日利亚注册，主要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建筑和电信领域（Umejei，2015 年）。到 2016 年，在投资机构注册的人数已增至 308 人，而这一数字可能要高得多（Sun 等人，2017 年）。陈等人。（2016）审查了允许在尼日利亚投资的中国企业数量的两个来源：尼日利亚投资促进委员会（NIPC）和中国商务部（MOFCOM），分别发现 221 家和 297 家，尽管不能保证他们实际投资。141 个商务部成员和 92 个国家知识产权委员会成员报告了制造业。

尼日利亚也是中国最慷慨的贷款受益国之一。尼日利亚在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从中国获得的贷款金额在非洲排名第四，在 2000 年至 15 年的较长时期内排名第六。（SAIS-CARI，2018）。然而，随着中国在

2017年为拉各斯-卡诺和拉各斯-伊巴丹铁路提供75亿美元的融资,预计这一数字将会上升(Adamu, 2017年)。他们是2011年继南非之后的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受益者。(Umejei, 2015年)。1995年至2017年间,尼日利亚是仅次于南非的中国商品的第二大进口国。在同一时间跨度内,对中国的出口一直位居前五(UNCTAD, 2018)。

尼中贸易关系

即使在两国非正式关系的整个时期,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联系也在增长。1958年中国对尼日利亚的出口额估计为140万英镑,1959年达到186万英镑。到1963年,尼日利亚是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摩洛哥之后,中国对非洲出口的第三大市场。然而,这一时期的贸易格局显示出对尼日利亚有利的严重失衡。无论是中国不愿光顾尼日利亚商品,还是尼日利亚在商业方面对中国的帮助不大,关键是中尼贸易的好处是中国受益,而不是尼日利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实际上需要这样一笔意外之财来建立外部储备,以便在欧洲进行工业采购。因此,排除了尼日利亚在此期间出于贸易目的与中国接近的要求。事实上,如果尼日利亚愿意,它可以切断与中国的商业联系,而不会产生负面后果(Ogunsanwo, 1974; Owoeye, 1986; Agbu, 1994; Chibundu, 2000)。

尽管尼日利亚发生内战(1967-1970年),但该国仍然是中国商品的稳固市场。例如,1969年中国对尼日利亚的出口总额为540万英镑,而1968年为372万英镑。1970年增加到703万英镑,1971年增加到1000万英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稳步下降。例如,虽然贸易价值在1981年为N3570万,但在1982年下降到N1780万。在1983年和1984年,它分别下降到N800万和N260万。这种下降趋势可以归因于尼日利亚政府的紧缩努力,这导致了货币限制和进口限制。此时尼日利亚对华出口的商品结构显示,中国主要从尼日利亚购买可可豆和腰果,而尼日利亚仅从中国进口轻工产品和化学品。另一方面,贸易平衡有利于中国。自1974年谢胡·亚尔·阿杜瓦准将访问北京以来,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差距一直令人担忧。在后来的谅解书中,中国同意购买大量棉花和棕榈仁,以及可可和腰果。坚果作为缩小贸易差距的一种手段。尽管如此,贸易逆差仍然存在(Owoeye, 1986; Chibundu, 2000)。

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额一直很低,直到1993年中国从原油净出口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近年来,中国和尼日利亚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额不断扩大。由于中国对能源的贪得无厌的渴望来推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中国曾经是亚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在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预计到2045年,中国45%的能源需求将依赖进口石油。因此,政府需要来自低成本的非洲或中东的供应东方资源(Ezirim, 2007; Utomi, 2008; Onuoha, 2008)。由于上述情况,中国采取了“走出去”战略,两国贸易和投资关系稳步改善。尼日利亚和中国签署了多项“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以相互提供优惠待遇。Onuoha (2008)表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国和尼日利亚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包括:

采取好措施,让非洲产品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例如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出口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中国与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或区域贸易任务。

湾。非洲是中国政府鼓励企业投资的地区之一。中国政府将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简化投资程序，加强引导和服务，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赴非洲投资。她将继续唱响并落实“鼓励和确保投资的双边协议”和“避免双重征税”，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C. 鼓励中国金融机构在非洲设立办事处，为中非贸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d. 加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为开拓非洲市场创造条件。

上述举措可能促成了近期中尼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例如，尼日利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从 1996 年的 1.78 亿美元增长到 2001 年 12 月的 14.4 亿美元。2002 年的贸易额为 11.68 亿美元，2003 年为 18.58 亿美元。2004 年价值为 20 亿美元，而 2007 年为 28.3 亿美元。中国是尼日利亚的十大贸易伙伴之一，在该国拥有 30 家企业（一些是独资企业，另一些是与尼日利亚人共同拥有的）。这些企业在尼日利亚经济的建筑、石油和天然气、技术、服务和教育领域开展业务。中国已签署价值超过 40 亿奈拉的石油勘探合同，其参与石油行业的条件是建设一个发电设施，该设施将为尼日利亚的电网贡献大量兆瓦电力（Momoh，2009 年）。

综上所述，奥巴桑乔总统任内，中尼双边贸易投资关系明显改善。另一方面，贸易平衡一直对中国有利。尽管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存在职能关系，但学者和专家对两国社会经济合作的好处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引起了敌意和批评。有人特别关注中国投资对尼日利亚经济安全的影响，中国向尼日利亚倾销劣质工业产品、缺乏从中国向尼日利亚的技术转让、尼日利亚投资生存的机会减少，这些都损害了尼日利亚的经济安全。在中国，以及对寻求在中国探索商机的尼日利亚人的签证和就业限制（Ogunsanwo，2018 年）。

在制度框架下，全球排名表明尼日利亚的制度环境薄弱，在“营商便利度、政府支出浪费、政府政策透明度和公共资金转移”方面排名第 125 位、第 120 位、第 79 位和第 119 位”分别在 133 个国家中排名第 39 位、第 35 位、第 32 位和第 55 位（Tajudeen, 2013）。

尼日利亚的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相对较低，应重点关注电力、港口、公路和铁路等重要设施。尼日利亚需要增加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资助，以确保其劳动力的长期增长。尼日利亚在技术准备方面做得很好，在尖端技术的可用性和公司级技术吸收等标准上得分平均，但这并没有转化为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Gimba，2018 年）

尼日利亚在创新方面并不缺乏，企业继续在研发上投入资金。然而，大学和行业之间存在不匹配，正如该国排名第 87 位而中国排名第 23 位所表明的那样。政府对现代技术产品的采购和科研机构的质量都令人遗憾，需要立即引起重视。由于走私到该国的中国商品质量低劣，尼日利亚经济正在遭受损失。停电、缺乏负担得起的融资来获取投入以及各种税收分别位居前、二、三位，这些原因导致尼日利亚商品与中国商品没有竞争力。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应保护当地制造企业免受不合格、补贴进口的关税和补贴外国产品的影响（Gimba，2018 年）。

中国对尼日利亚的投资

2006年至2013年间,中国的投资使从非洲合法和非法汇回中国的利润增加了一倍多,而在非洲大陆只有15%的利润以税收方式缴纳。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12年),尼日利亚在中国对西非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占次区域投资总额870亿美元的70%,占非洲1.3万亿美元投资总额的11%。仅尼日利亚的石油部门就从中国获得了大约80%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报告称,尽管中国在非洲的大量投资应使双方受益,特别是在技术转让和平等市场准入方面,但许多非洲国家的工业进口仍依赖中国,以换取低价值的初级产品。农产品,这已经改变了贸易和投资平衡的规模。据先锋报(2021年2月8日)报道: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周一表示,尽管近年来尼日利亚经济脆弱,但它仍然是中国在非洲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中国驻尼日利亚代办赵勇在阿布贾举行的庆祝尼中关系50周年的媒体活动中还透露,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已达2087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491亿美元。据勇介绍,2019年中尼贸易额达192.7亿美元,是1971年建交时的1900倍。Yong吹嘘说:“尽管受到Covid-19的不利影响,但2020年1月至10月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0.7%,比中非整体贸易增长率高出14%。“尼日利亚分别超过安哥拉和南非,成为中国在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同时,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洲的主要投资目的地。

根据Pease(2010)的说法,非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新鲜,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0年代初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从1956年向埃及提供200万美元贷款开始,中国也向大多数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非洲国家提供一揽子援助。自1998年中国政府启动“走出去”战略,通过中国公共和私营企业占领全球市场以来,Ogunrnu(2017)认为,通过以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为中心的投资战略,中国对非洲的FDI一直在增加,以探索非洲石油和天然气为中国工业增长提供动力。

根据Ian(2006)的说法,中尼关系的基本关注点是贸易和工业,在这方面,尼日利亚为了在该国建设工业而对中国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作者还研究了当前两国关系的驱动因素,即以尼日利亚的石油换取中国的帮助。尽管伊恩努力记录尼中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但他的作品并未涵盖双边关系的其他重要方面,例如尼日利亚人在中国企业中的工作条件等。

根据江(2009)的说法,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为中国在尼日利亚的460亿美元投资开辟了道路。然而,他的研究并未提及尼日利亚不喜欢中国工业产品,许多尼日利亚人认为中国工业产品不合格。Oniku和Gbadamosi(2009年)对尼中双边关系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考察了1999年至2007年非洲主要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国家)之间贸易和外交联系的演变。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已经从与尼日利亚的双边关系中获益更多,1997年至2007年间从该国汇回超过840亿美元,而同期尼日利亚的非国家行为者从中国汇回的收入不到100亿美元。除此之外,还有贸易失衡和大量中国贷款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慢慢将尼日利亚拖入债务困境。Davies Martyn(2008)在其著作《经济特区:中国的发展模式》中认为,就非洲而言,如果不迅速扭转尼日利亚债务过剩的危险趋势,中国将能够使尼日利亚的经济出口和进口导向有利于中国(戴维斯,2008年)。

另一方面,中国寻找石油和天然气似乎是当前恢复接触浪潮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公民不能幸免于最近在尼日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发生的社会动荡,该地区是该国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所在地。一些中国石油雇

员被激进分子绑架，他们为更公平地分配该国资源而战。尽管上述关于尼日利亚的著作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们有助于深入了解尼中双边关系的起源、性质和维度。

中国对尼投资的影响

在尼日利亚，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和公路领域。其他中国投资兴趣包括铁路建设、电力和电信，其中中国石化、中石油和 CNOOC 是尼日利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最重要的中国投资者，截至 2015 年的投资总额为 7134 亿美元。根据尼日利亚国营石油公司的数据，2019 年尼日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仅达到 160 亿美元。虽然尼日利亚的石油行业欢迎中国的兴趣，但分析师担心该行业缺乏透明度以及该国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缓慢（Chika，2019 年）。

CCECC、CGC、SINOMA 和 CSCEC 是在尼日利亚的四大中国建筑企业，总投资额达 1154.1 亿美元。中建委负责建设铁路、房屋、公路、桥梁、房屋，中建委负责建设机场和水坝等供水工程。中材是水泥制造商，中建是房地产开发商。电信领域最大的企业是中兴通讯和华为，2015 年中国投资近 550 亿美元。山东电力是尼日利亚电力领域的大投资者，总投资额达 409 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在油气领域的投资已超过其他国家。原油饮料、动物皮和艺术材料是尼日利亚向中国出口的 120 亿美元（Shiitu，2018 年）。

综上所述，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规模庞大且不断扩大，而尼日利亚在中国的投资规模则小得多，部分原因是尼日利亚在中国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使其经济安全面临中国霸权的威胁。尼日利亚必须提高内部能力才能在中国的竞争环境中竞争。尽管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规模可观，但其对尼日利亚的发展效益值得商榷，因为这些投资所产生的大部分利润没有再投资，而是汇回中国以促进其经济增长，从而阻碍了尼日利亚的发展。中国在石油和天然气、电力、电信和建筑行业的投资增加了尼日利亚对中国电信设备的依赖，而不是通过技术转让促进尼日利亚制造的 ICT，导致尼日利亚经济缺乏创造力和多元化，从而在自力更生方面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石油行业是尼日利亚的支柱产业，该国 80% 的对外贸易收入来自该行业，但该行业主要由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管理，这一事实危及该国的经济安全，因为这使他们能够获得有关原油来源信息的特权。尼日利亚石油经济建立在相对成功的基础上，以及如何取得这样的成功。

据 Shiitu（2018 年）称，尽管尼日利亚本土制造公司与外国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但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继续增长。由于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上述所有不利情况都使尼日利亚经济面临增长迟缓的危险，并损害其新兴行业。还有尼日利亚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尼日利亚 60% 的电子产品进口来自该国，因为中国商品比从欧洲购买的商品便宜。由于尼日利亚较高的生产成本、高昂的管理费用和破旧的生产基础设施，许多尼日利亚中端产业无法在市场上销售其产品，从而危及当地公司在激烈竞争中面临倒闭的安全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尼日利亚的腐败也危及该国的经济安全，因为包括联邦税务局在内的该国众多税务机构低估了中国的公司税，导致数百万美元的收入损失。中国企业对尼日利亚工人的残酷对待也危及他们自身的财务稳定，因为许多人被无故解雇，而有些人工作过度，工资过低。

由于中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涌入尼日利亚，许多新兴的当地产业被淘汰出局，导致这些人失业和个人经济不安全。由于中国纺织公司在卡诺州的存在，许多尼日利亚人失去了工作，因为这些企业导致许多当地企业

因为无法与这些企业竞争而关闭。尼日利亚还保持着中国商品的大市场，推动了中国经济而不是尼日利亚的经济，使后者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还主要向想从中国进口的尼日利亚人发放签证，从而危及尼日利亚的经济安全，使许多尼日利亚人选择相对便宜的中国商品而不是当地生产的商品，导致当地产业逐渐崩溃。包括中兴在内的许多中国公司不在尼日利亚制造，因为他们的大部分产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配备了设备和技术人员，危及许多尼日利亚人的工作保障（Chika，2019年）。

与支持伙伴关系的国家政府不同，中国在尼日利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受到了许多学者和社会组织的质疑（Konings，2007）。虽然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发展模式（Alden，2005），但另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在非洲大陆的行为与新殖民历史之间存在联系（De Lorenzo，2007）。Hood and Young (1981) 方法已被用于使用社会、竞争、商业和其他变量来分析跨国经营。

社会影响

可能很难评估中国参与尼日利亚的利弊。尼日利亚近期的经济增长达到了新高，这部分归功于中国的投资（Hanson，2008年）。此外，中国的高速公路、桥梁和水坝对国家的基础设施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这种联系鼓励政府扼杀政治和经济改革努力。

贸易效应

在贸易、商业和社会问题领域还有更多有争议的问题。根据 Kaplisky 等人的说法，非洲的贸易，特别是尼日利亚的贸易，受到两方面的影响。（2007年）。内向型制造业的内部市场竞争是一方面，外向型产业的外部市场竞争是另一方面。贸易平衡有利于中国，因为当地工业和商人已经被大量建立网络销售商品的低成本中国批发和零售机构严重破坏（Alden，2005）。此外，尼日利亚制造商无法在非洲市场与中国公司竞争，因为中国公司的生产成本和市场定价较低（Tull，2006年）。

竞争效应

在中国资助的尼日利亚项目中，当地人反对雇用中国劳工而不是当地工人（Alden，2005年）。De Lorenzo (2007) 还强调，中国竞争对尼日利亚公司和出口的影响令人担忧。进口纺织品导致尼日利亚当地纺织品制造商倒闭。

失业效应

比赛并不是唯一可以发现这些障碍的地方。据鞍山（2007年）称，由于商品从中国涌入，劳动力实践和市场战略的分歧正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中国管理人员雇用中国公民的倾向，以及对他们的超长工作时间的要求，正在与当地劳动法律和规范产生摩擦。此外，社区成员对中国企业的活动不满意，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促进当地就业和加强当地经济方面做得不够。另一个争论点是中国商品的质量，它比本地制造的商品更便宜，质量更高。

劳动影响

尼日利亚劳工大会（2016年）指责在尼日利亚的中国公司被“关闭”，声称他们很少雇用训练有素的当地专家。工会表示，尼日利亚人在中国企业的工作条件不符合尼日利亚劳动法或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标准。

欧盟进一步声称，从中国 FDI 到尼日利亚的技术转让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大多数中国公司将制成品带入尼日利亚并由中国人员完成设备。

道德影响

根据茨威格和建海（2005）的说法，“北京以资源为基础的对外战略几乎没有道德空间。”毕竟，世界上一些最有价值的资源是在管理不善的国家中发现的。中国与流氓国家建立了联系，这有时会导致这些国家公民的暴力报复。他们在苏丹、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的经历提供了一些例子。例如，赞比亚谦比希铜带的抗议劳工遭到中国老板的枪击（Trofimov，2007 年）。

调查结果和结论

调查结果还显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其生产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融资能力，为尼日利亚提供了激励。由于尼日利亚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参与已经远远超出石油。尼日利亚的制造业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正在看到来自中国公共和私营公司的投资。他们正在尼日利亚各地建设新的公路、火车和机场，并开发两个经济特区。中国还因其提供无条件援助的政策——即所谓的“合作”——以帮助实现发展目标而受到认可。数百名中国专家正在带来新技术和新技术，以努力提高尼日利亚的农业产量。近期中尼关系的发展与两国关系重燃不无关系。中尼虽于 1972 年建交，但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双方发生了巨大的积极互利发展。

调查结果还显示，中尼双边关系规模巨大，具有战略意义，并持续呈指数级增长，尤其是在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时期（1999-2007 年）。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已经从意识形态驱动的反殖民主义和冷战团结，发展为务实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接触。中国和尼日利亚的商业关注使双边贸易和投资逐步增加。今天，尼日利亚从中国需求推动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受益匪浅。此外，尼日利亚普遍认为中国是现代化的典范，比西方伙伴更能满足非洲的需求；并且能够提供更适合尼日利亚人口袋的消费品。

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规模庞大且不断扩大，而尼日利亚在中国的投资规模要小得多，部分原因是尼日利亚无法在中国与中国产品竞争，使其经济安全面临中国霸权的威胁。尼日利亚必须提高内部能力才能在中国的竞争环境中竞争。尽管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规模可观，但其对尼日利亚的发展效益值得商榷，因为这些投资所产生的大部分利润没有再投资，而是汇回中国以促进其经济增长，从而阻碍了尼日利亚的发展。中国在石油和天然气、电力、电信和建筑行业的投资增加了尼日利亚对中国电信设备的依赖，而不是通过技术转让促进尼日利亚制造的 ICT，导致尼日利亚经济缺乏创造力和多元化，从而在自力更生方面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石油行业是尼日利亚的支柱，该国 80% 的对外贸易主要由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管理，这一事实危及该国的经济安全，因为这使他们能够获得有关石油来源信息的特权。尼日利亚石油经济建立在相对成功的基础上，以及如何取得这样的成功。

参考

Agbebi, M., & Virtanen, P. (2017). 依附理论——理解中国在非洲存在的概念镜头？发展研究论坛，44(3), 429-451。

- 奥尔登, C. (2005年)。中国和非洲。生存, 47(3), 147-164。
- Alden, C. 和 Davies, M. (2006)。中国跨国公司在非洲的经营概况。南非国际事务杂志, 13(1), 83-96。
- 鞍山, L. (2007)。中国和非洲: 政策和挑战。中国安全, 3(3), 69-93。
- Awe, A. A., Olawumi, O. R. (2012), 尼日利亚经济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 1997 – 2005, 国际商业与管理, 15(1), 126-137。
- Adamu, A. (2017年)“尼日利亚从中国获得 75 亿美元的铁路项目贷款”, Amaechi Premium Times, 2月6日, <https://www.premiumtimesng.com/news/headlines/222767-update-nigeria-secures-75-50-亿贷款中国铁路项目-amaechi.html>。
- Akongbowa, B. A. (2008)。尼中经济合作: 概念、争论的问题和前景及其对西非次区域的影响。第12届EADI大会, 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 日内瓦 24-28, 第9页
- Alli, W. O. (2007)。与中国交往的前景和挑战。拉各斯: NIIA。
- Alobo O.J. (2014) 尼日利亚-中国贸易关系和尼日利亚经济发展, 2001-2013 提交给尼日利亚大学 Nsukka 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的研究项目, 部分满足获奖要求国际关系理学硕士学位 (M.Sc.)
- Adeseko, D. (2015)。尼日利亚民主: 有多贵? 取自 <http://www.mynews-watchtimesng.com/nigerian-democracy-expensive/>
- Ajayi, A. T. & Ojo, E. O. (2014)。尼日利亚的民主: 实践、问题和前景。发展中国家研究, 第4卷, 第2期, 107-125。
- Ampiah, Kwaku 和 Sanusha Naidu. 2008。《卧虎藏龙?: 非洲与中国》, 12-17。开普敦: 夸祖鲁-纳塔尔大学出版社。
- Babajide, A. A., Adegboye, F. B. 和 Omankhanlen, A. E (2015) 尼日利亚的金融包容性和经济增长, 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杂志, 5(3), 629 – 637。
- Bai, C. E., Ma, H., & Pan, W. (2012)。中国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评论, 23(4), 982-990。
- Brautigam, D. (2003)。近距离接触: 中国商业网络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业催化剂。非洲事务, 102, 447-467。
- Bohon, S., Dahms, H.F., Dandaneau, S. P., Freu, R.S., Gellert, P. Jalata, A. & Shefner, J. (2003)。政治经济。田纳西州: 田纳西大学文理学院; 社会学的发展。
- Brautigam, D. 和 T. Xiaoyang (2013年)“集体走出去”: 结构转型和中国的海外经济特区, 世界发展 63: 78-91。
- 贝尔, D. A. (2015)。中国民主并非不可避免。大西洋组织。取自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5/chinese-democracy-isnt-inevitable/394325/> 冠军新闻。(2014年11月20日)。在任何地方实践民主都是昂贵的——恩泽里贝。取自 <http://www.championnews.com.ng/democracy-is-expensive-to-practice-anywhere-nzeribe-2/>
- Chika O. (2019)。中国在尼日利亚石油部门投资 160 亿美元。 https://www.voanews.com/a/africa_china-invests-16-billion-nigerias-oil-sector/6174771.html
- 陈, Y. Sun, I. Y. Ukaejiofo Y., Xiaoyang, T. 和 Brautigam, D. (2016)。向中国学习? 尼日利亚的制造、投资和技术转让。SAISCRI, 工作文件 2, 1月。

- 丹尼尔, I.U. (2015)。尼日利亚的政治参与和民主文化:以尼日利亚为例。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 10 (1): 32-39。
- 戴维斯, 马丁。(2008年)。《经济特区:中国发展模式走进非洲》。In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nd Influence, Rotberg, Berga, 137-145 Maryland: Brooking Institute Press 主编。
- 德洛伦佐, M. (2007年)。非洲对中国的看法。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 Gbadamosi, A. 和 Oniku, A. C. (2009年6月)。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协定的战略意义;尼日利亚的情况。在国际艺术与科学杂志会议上(第1卷,第18期,第(115-130)页)。
- Gimba Z. 和警长 G.I. (2018年)。中尼经济关系:需要加强资源管理以促进发展。国际科学研究与发展趋势杂志(IJTSRD)。2(3)。
- 刘易斯, P. (1999)。尼日利亚的经济;机遇和挑战。非洲问题, 27(1), 50-53。
- Perkins, D. H. 和 Rawski, T. G. (2008)。预测中国到2025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大转型, 826-860。
- Agbu, O. (1994)。“促进尼中关系”, 尼日利亚论坛, 卷。14, 第11至12号, 11月至12月。
- Chibundu, V. N. (2000), 尼日利亚-中国对外关系, 1960-1999, 伊巴丹: Spectrum Books Limited。
- Ezirim, G. E. (2007年)。“对中国-在-非洲辩论的反思:重商主义、伙伴关系还是霸权复兴?”, 国际政治与发展研究杂志, 第1卷。3, 第1期, 7月/12月。
- 哈里, D. (2016年)。2001-2013年尼日利亚出口加工区和经济多元化。政治学与领导研究杂志, 2(2)。
- 哈里, D. (2018年)。尼日利亚出口加工区的增值政策:亚洲经济体的经验教训。地中海社会科学杂志, 9(3)。
- Imhonopi, D. & Urim, U. M. (2011)。全球气候变化对尼日利亚不断发展的民主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和创意艺术杂志, 卷。6、1、110-123。
- Imhonopi, D. & Urim, U. M. (2012)。创业发展与尼日利亚商业生态。非洲小额信贷与企业发展杂志, 卷。2, 第2期, 46-57。尼日利亚埃多州:贝宁。
- Imhonopi, D., Onifade, C. A. & Urim, U. M. (2013)。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概念审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杂志, 卷。3(9), 53-63。
- Imhonopi, D. & Urim, U. M. (2015)。缩小尼日利亚日益膨胀的青年不稳定阶层:增强青年权能的必要性。非洲研讨会, 卷。15, 第1号, 69-82。
- Imhonopi, D. & Urim, U. M. (2016)。尼日利亚昂贵的民主政治和失业:与中国的比较。在 C. Enwere 和 M. Khalil-Babatunde (Eds) 中, 尼日利亚的比较研究:来自全球南方的教训。尼日利亚阿布贾:尼日利亚土耳其尼罗河大学。
- Kwanashie, M. (2007)。中尼关系:对贸易的影响。尼中关系圆桌会议:拉各斯, 尼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NIIA)的经济和政治维度, 第2页
- 美国的民主真的比中国的独裁好吗?(2015年)。取自 <https://www.quora.com/Is-American-democracy-really-so-much-better-than-Chinese-dictatorship>
- 江 W. (2009)。“为龙加油:中国的崛起及其在非洲的能源和资源开采”。中国季刊(199)(09): 585-615。
- Jamo, I. A. (2009)。尼日利亚的民主与发展:问题与挑战。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与非洲寻求发展国际会议论文集。艾哈迈杜贝洛大学扎里亚行政学院

- Jamo, I. A. (2013)。尼日利亚的民主与发展：有联系吗？阿拉伯商业和管理评论杂志（阿曼章）卷。3，第3期，85-94。
- Konings, P. (2007)。中国和非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中社会杂志，23（3），341-367。
- Lawal, S. M. (2015)。尼日利亚选举制度中的腐败评估。欧洲科学杂志，第11卷，第256-273页。
- 莱昂内尔 R. (1932)。论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的论文。
- 赖 H. H. (2007)。中国的石油外交：它是全球安全威胁吗？第三世界季刊，28(3)，519-537。
- Lumanyano N. (2018)。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可在：<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4773448>
- Mlambo C、Kushamba, A. 和 Simawu, M.B. (2016年)。中非关系：背后是什么？中国经济，49，257-276。
- Momoh, Siaka (2009)，“尼中关系有多整洁”，http://www.businessdayonlin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
- 莫里森, W. (2014年)。中国经济崛起：历史、趋势、挑战和对美国的影响。国会研究服务。取自www.crs.gov
- 恩达-以赛亚, J. (2015)。布哈里：一个没有完整部长职位的内阁。领导报纸。取自<http://leadership.ng/news/471461/buhari-a-cabinet-without-complete-ministerial-portfolios>
- Ogunsanwo, A. (1974)，中国对非洲的政策，1958-1971，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
- 奥克, L. (2005年)。全球化、民主和妇女赋权：尼日利亚的问题和挑战。在 Olufayo, O. (Ed.), 全球化和非洲发展的观点。拉各斯：博拉贝出版物。
- Onuoha, J. (2008)，超越外交：国际关系中的当代问题，Nsukka：Great AP Express Publishers Limited。
- Omolade A. 和 Howard S. (2019)。中国在尼日利亚投资的政治经济学。牛津奖学金在线。第194页
- Owoeye, J. (1986)，“尼日利亚与中国”，Olusanya, G. O. 和 Akindele, R. A. (eds.) 尼日利亚的对外关系：前二十五年，伊巴丹：伊巴丹大学出版社
- SAIS-CARI (2018) “数据”<http://www.sais-cari.org/data/>。
- Ogunru, O. (2017)。“中国在尼日利亚投资对国家发展的影响”。研究生论文。伊洛林大学和平与战略研究中心，9-16。
- Ogunsanwo, A. (2018)。中国在非洲的政策，23-28。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
- Oniku, C. 和 Gbadamosi, A. (2009)。“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协定的战略意义：以尼日利亚为例”。国际艺术与科学杂志会议 1(18):115-130
- Pigato, M. 和 Tang, W. (2015)。中国和非洲：在不断变化的全球背景下扩大经济联系。投资非洲论坛，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取自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41321468024314010/China-and-Africa-expanding-economic-ties-in-an-evolving-global-context>
- 皮斯, K. (2010)。“中国在非洲：用基础设施和现代化来治愈资源诅咒”。可持续发展法律和政策。12（3）。35-41、57-60。
- 雷诺, 威廉。(1999)。“弱国的描述性政治逻辑”。在军阀政治和非洲国家，由 Edbong Moore 编辑 23-28。
- Ramani, S. (2016年)“中国-尼日利亚关系：北京软实力的成功故事”，外交官，7月12日，<https://thediplomat.com/2016/07/china-nigeria-relations-a-success-story-for-beings-软实力/>。
- 拉莫斯, J. C. (2004)。北京共识。在 Zafar, A. (2007)。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日益增长的关系：宏观经济、贸易、投资和援助联系。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员提前访问。

- Sautman, B. 和 Hairong, Y. (2007)。朋友和兴趣：中国与非洲的独特联系。非洲研究评论，50 (3) ， 75-114。
- 斯坦因，H (2012)。非洲，工业政策和出口加工区：亚洲的教训。在 Noman, A. Botchway, K.、Stein, H 和 .Stiglitz, J. (Eds.)，非洲的良好增长和治理：重新思考发展战略。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苏伦德拉 P.，(2012 年)。中国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劳工的启示。新德里工人教育中心。
- Sun、I. Y.、K. Jayaram 和 O. Kassiri (2017 年) “与狮与龙共舞：非洲和中国如何参与以及合作将如何发展？”麦肯锡和公司报告，6 月，<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middle-east-and-africa/the-closest-look-yet-at-chinese-economic-engagement-in-africa>。
- Shiitu A.R. 和 Adenike O. (2018)。中国投资及其对尼日利亚经济安全的影响。巴西非洲研究杂志。3(6)，第 3 页。123-142
- 站立，G. (2012)。不稳定者：为什么需要协商民主。开放民主。取自 <http://www.opendemocracy.net/guy-standing/precariat-why-it-needs-deliberative-democracy>
- 这天。(2010)。我们昂贵的民主。取自 <http://www.thisdaylive.com/articles/our-expensive-democracy/85589/>
- 塔朱丁。J. A (2013)。尼中贸易关系：对尼日利亚国内经济的影响。财务与会计研究杂志。第 4 卷，第 17 期。
- 泰勒 G. (2004)。中国纺织品贸易。时尚营销与管理杂志，8 (2) ， 136-140。
- 经济学家。(2018 年)。在非洲的中国工人和商人。经济学家。取自 <https://www.economist.com/special-report/2018/05/17/chinese-workers-and-traders-in-africa>
- 特罗菲莫夫，Y. (2007)。新管理：在非洲，中国的扩张开始引起反感；投资热潮助长“殖民主义”指控；赞比亚的悲剧。华尔街日报 (东部版)。
- 贸发会议。(2018 年)。在线统计。取自 <http://unctad.org/en/Pages/Statistics.aspx>
- Utomi, P. (2007)。中国和尼日利亚。7 月 13 日从 <http://csis.org/files/media> 检索
- Umejei, E. (2015 年) “中国与尼日利亚的接触：机会还是机会主义者？”非洲东亚事务：中国监测第 3 期和 12 月 4 日。
- 贸发会议 (2018 年) “在线统计”，<http://unctad.org/en/Pages/Statistics.aspx>。
- Usman, S. (2010 年) ，洞察尼日利亚经济状况，由 Hon 发表演讲。卡诺巴耶罗大学国家计划委员会部长。可从：<http://www.npc.gov.ng/main/ministerspeech>。
- Urim, U. M. & Imhonopi, D. (2013)。民主的尼日利亚化：如何让它发挥作用！”在 D. Imhonopi 和 U. M. Urim (Eds)。一系列社会科学读物：尼日利亚的教训和来自尼日利亚的教训。拉各斯：圣约大学社会学系。
- Udeala, O. (2008)。外交政策和尼日利亚形象项目：限制和挑战。尼日利亚论坛，卷。29，Nos.11-12：11 月至 12 月，第 72 页。
- Utomi, P. (2009)。中国和尼日利亚 <http://africa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09/10/01/China-and-Nigeria.pdf>。
- 先锋报 (2021 年 2 月 8 日)。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洲的主要投资目的地。
<https://www.vanguardngr.com/2021/02/nigerias-chinas-major-investment-destination-in-africa/>
- 沃尔德伦，A. (2008 年)。中国在非洲。
- Wu, Y. (2000)，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生产力分析，中国经济评论，11(3)，278-296。
- 温平，H. (2007)。中国对非政策的平衡行为。中国安全，第 3 期，第 23-40 页。

世界计。(2016年)。尼日利亚人口(2016年和历史)。取自 <http://www.worldometers.info/world-population/nigeria-population/>

世界银行(2018年)“国际债务统计:尼日利亚”,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debt/ids/country/NGA>。

扎法尔, A. (2007年)。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日益增长的关系:宏观经济、贸易、投资和援助联系。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员, 高级访问。

Zweig, D., & Jianhai, B. (2005)。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源。外交事务, 84(5), 25-38。

郑。S., Fu, Y., & Liu, H. (2009)。中国对城市生活质量的需求:补偿土地——租金和工资——差价的演变。房地产财经杂志, 38(3), 194-213。